


新史学

第九辑

New History

观念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Idea

 大象出版社

新史学

New History

第九辑
观念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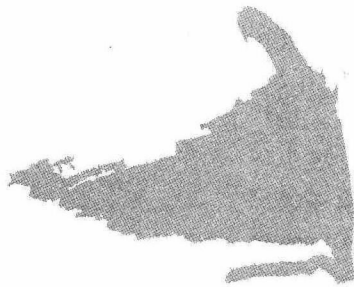
The History Of Idea

主 编

陈 恒 耿相新

执行主编

王秦伟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史学. 第9辑/陈恒, 耿相新主编. —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 - 7 - 5347 - 5435 - 7

I. 新… II. ①陈…②耿… III. 史学—文集
IV. K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4434 号

出版人 李亚娜

策划人 耿相新

责任编辑 王莉娜

责任校对 何力

封面设计 秘金通

版式设计 王敏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34 千字

印 数 1—2 000 册

定 价 29.8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 - 351

主 编 陈 恒 耿相新

执行主编 王秦伟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中国社会科学院)

邓晓芒(武汉大学)

刘北成(清华大学)

朱孝远(北京大学)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

何兆武(清华大学)

张广智(复旦大学)

陈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

倪梁康(中山大学)

钱乘旦(北京大学)

梁志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Frank Ankersmit(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Jerry H. Bentley(美国夏威夷大学)

Lucian Hölscher(德国波鸿大学)

Donald R. Kelley(美国拉特格斯大学)

Jürgen Kocka(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Chris Lorenz(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Jörn Rüsen(德国埃森人文学科学研究所)

Gunter Scholtz(德国波鸿大学)

Richard T. Vann(美国卫斯理公会大学)

Immanuel Wallerstein(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 健(中国社会科学院)

宋立宏(南京大学)

陈 新(复旦大学)

夏俊霞(南开大学)

彭 刚(清华大学)

目 录

观念的历史

- 3 历史的概念——古代的和现代的
汉娜·阿伦特 文
- 40 历史记注
朱渊清 文
- 85 思想史研究诸视野：回顾、审视和展望
唐纳德·凯利 文
- 113 历史与逻辑的三重涵义
查常平 文
- 128 作为象征符号具形化的制度
卡尔-西格博·莱贝格 文
- 赫尔德：一种新历史观
- 149 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
罗亚尔·施密特 文

目 录

160 赫尔德对于历史因果关系和历史连续性的处理

F. M. 巴纳德 文

174 “生命的隐喻”:赫尔德的历史哲学与 18 世纪后期自然科学的不平衡发展

埃利亚斯·帕尔蒂 文

永恒的主题:法国大革命

203 我们得到的世界:法国大革命的未来

林·亨特 文

220 法国大革命论战语境中的“光荣革命”

张丽艳 文

241 与林·亨特的对话

林·亨特 文

日本欧洲史研究

249 古希腊的国家与共同体

前泽伸行 文

目 录

264 “欧洲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形成

土肥恒之 文

后现代史学

279 现代的完整性

贺伯特·博德 文

283 创伤与苦难：一个被遗忘的西方历史意识根源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 文

296 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

佐藤将之 文

观念的历史

173108

历史的概念

——古代的和现代的*

□ 汉娜·阿伦特 文 计海庆 译



汉娜·阿伦特



希罗多德

一、历史和自然

让我们从希罗多德开始——西塞罗称之为“历史之父”，同样他也保持着“西方历史之父”的称号。^①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中第一句话便告诉我们：他的工作

就是保存那些因人而生的事物（τα γενομενα εξ ανθρωπων），即人类的作为和业绩，不使其在时间中淹没，称颂这些古希腊人和异邦人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以使后辈铭记，光照千秋。

这句话告诉了我们许多，但还不是全部。对我们来说，关注不朽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而这在希罗多德看来是理应如此。正是在这点上，希罗多德没有讲更多。把人类的业绩从由遗忘而

* 作者的“古代”和“现代”两个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历史意义上的和观念意义上的。“古代”如果指某个历史时期，对应的则是古希腊城邦制的繁盛时期，如指的是观念，便是那一时期的观念体系；“现代”对应的历史时期，指的是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时段，观念层面指的则是“现代性”的观念体系。在译法上，modern age和modern都处理为“现代(的)”、“现代观念的”或“现代性的”。此外，本文的脚注都是译者所加，尾注则是原文中的注，次序未打乱。

① 西塞罗，*De legibus*（论法律），I, 5；*De oratore*（论演说家），II, p.55。在第一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那里，并没“历史”这样的词。他用的是ιστορειν（古希腊语意：叙述所知的情况，原原本本的叙述），但在“历史的叙述（historical narrative）”意义上用它。和ειδεναι（认识）一样，ιστορια是从ιδ（看）衍生而来，而ιστωρ原来的意思是“目击者”，然后发展为通过证据来探究并获得真理的人。因此，ιστορειν有两个意思：见证和探究（See Max Pohlenz, *Herodot, der erste Geschichtsschreiber des Abendlandes*, Leipzig and Berlin, 1037, p.44）。在最近关于希罗多德和历史观念的讨论中，C.N.Cochrane提出了一个意外但有趣的观点，见C. N. Cochrane的 *Christianity and Classical Culture*, New York, 1944, 第12章。他的主要观点是：希罗多德应被划归伊奥尼亚哲学学派，他是一个赫拉克里特的追随者。同古代的资料相反，Cochrane把历史科学构建为古希腊哲学发展中的一部分。见注6，以及Karl Reinhardt的“Herodots Persegeschichten”，*Von Werken und Formen*, Godesberg, 1948。

生的徒劳中拯救出来,是希罗多德所理解的历史的任务,它源自古希腊人的观念和对自然的体验;包容着所有自发生成、不经人力或神力的事物,便是自然;哪怕是奥林匹亚神也不能宣称创造了自然,^②自然即是不朽。自然的事物总是在那里,它们不太能被忽视或遗忘;由于是永在的,它们不需要人们的记忆来达成其更深层的生存。所有有生命的事物,人也不例外,都被包含在这永在的领域中。亚里士多德断言:作为自然存在,并属于自身这一类别的人,是不朽的。通过生生不息的循环,自然确保了有生有死的事物和不变的事物一样,永远存在(αει ειναι)。“存在对有生命的事物来说就是生命本身”,而永远存在指的就是他们的繁衍,^③αειγενες。

无疑这一永恒的循环,造就了“一个很大程度上接近于永在的世界”^④;但是当然,它并没有赋予个人以不朽,相反,寄居于宇宙中的人,相对宇宙中所有其他不朽的事物来说,只有个人的生

存才具有可朽(即有死的,mortality)的特质。人是“可朽的凡物”,是存在事物中唯一可朽的;动物的生存只是作为种族的成员存在,而不是作为个体。人的可朽是基于如下事实:拥有一个可流传的从生到死的生命故事的个体生命(βιος)是生物性生命(ζωη)的升华。这一个体生命,以它直线式的运动轨迹区别于其他所有的事物,也以此突破了生物性生命的圆形运动轨迹。在宇宙中沿着直线轨迹行进,这就是可朽;而其他事物只是循环往复地运动,如果这也算得上运动的话。无论何时,当人们追求着自己的目的:耕种着松软的土地,让随意流动的风鼓动风帆,航行于永不停息的波涛中,他们便打破了无目的的、自在事物的运动。索福克勒斯在著名的歌剧《安提戈涅》中说,没有什么比人更令人惊叹的了,他举例道,人类有目的的活动干扰了自然,如果没有人类的话,自然将保持存在的永恒宁静和自身的循环运作。

② “大多数民族的神话都认为,神曾经创造了世界。但关于奥林匹亚诸神,并没有这一说,他们最多是征服了世界”(Gilbert Murray, *Five Stages of Greek Religion*, Anchor edition, p.45)。但也有人举出反例认为,柏拉图在《蒂迈欧篇》(*Timaeus*)曾引入了一个世界的造物神(creator of the world)。但柏拉图的神并非真正的造物主,那只是一个demiurge,一个建筑了世界的神,他并没有从虚空中把世界创造出来(demiurge的工作只是用物质材料筑起了世界,真正的造物主则是无中生有般的变出了世界,译者)。而且,柏拉图只是在他自己创造的神话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这和他著作中别的神话一样并不是被普遍认可的。没有神也没有人曾创造了宇宙,这一思想在赫拉克利特残篇30卷(Diels)中得到了完美的表述:宇宙万物的法则无非是“一团此消彼长的永恒活火,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

③ 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On the Soul*), 415b13, 以及《家政学》(*Economics*), 1343b24; 通过不断地循环繁衍,自然完成了物种的永在性,但这并非针对个体而言。《家政学》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学生的伪作,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在亚里士多德关于生成(Becoming)概念的《论产生和衰败》(*on Generation and Corruption*)中,可以发现类似的论述:生成是一个循环(γενεσις ες αλληλων κυκλω), 331a8。同样的观点在柏拉图那里被表述为“不朽的作为物种存在的人”,参《法律篇》, 721, 注9。

④ 尼采:《权力意志》(*Wille zur Macht*), Nr.617, Edition Kröner, 1930。

对我们来说,难以理解的是:作为历史叙事的主题——凡人所能做出的伟大功业,并没有被视为包含在一个整体性过程中的某个部分;相反,单个事件总是受到重视。这些单个的事件和单独的行为打断了日常生活的循环运动,这和可朽的个体生命(βίος)的直线轨迹打破了生物学生命的循环运动,是一个道理。历史探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这种打断,换言之,就是非凡的事迹。

在古代晚期,人们开始以一种过程的方式,来思考历史的本质和民族的历史命运及其兴衰;特殊的作为和事件便被整体所吞没,于是这些过程立刻被设想为:必定是一个循环。由此,历史运动开始以生物性生命的图景进行建构。在古代哲学看来,这也许意味着历史世界被再次整合进了自然世界,即人类的世界被整合进了永恒的宇宙中。在古代的诗歌和历史记载^⑤看来,这意味着早期意义上的凡人的伟大已经丧失了,尽管这种伟大是区别于神和自然的更高的伟大的。



里尔克

在西方历史的开端,人的可朽和自然的不朽的区分,人造事物和自发生成的事物之间的区分,是历史记载默认的前提。所有因人而生的事物,例如制品、作为、言论,都是易逝的,这是由其作者的可朽性决定的。但如果人们成功地赋予这些事物以持久性,阻止它们逝去,那么它们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进入并居留于永恒的世界中,而人们也将找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在那里原本一切皆不朽,除了人之外。能达成此项的人类能力,便是记忆。正是出于此,Mnemosyne才被认为是其他缪斯之母。

为了尽快地领会并清晰地衡量出,今天我们偏离这一古希腊人关于自然和历史、宇宙和人之间联系的理解,是多么遥远,让我们引证里尔克的四句诗,姑且让它们保持德语原文,因为其中的完美似乎是译文无法企及的:

Berge ruhn, von
sternen überprächtigt;
Aber auch in ihnen
flimmert Zeit.
Ach, in meinem wilden
Herzen nächtigt.
Obdachlos die Un-
vergänglichkeit.^⑥

^⑤ 作者着意区分了古代和现代两种历史概念,这在用词上也有体现。historiographer和historiography指古代的历史记录者以及他们笔下的历史;historian和history指现代的历史学家和过程化了的历史,为了在译文中保持这一区别,本文把前两项译为“历史记录者”和“历史记录(载)”,后两项译为“历史学家”和“历史”。

^⑥ 里尔克(Rilke):*Aus dem Nachlass des Grafen C.W., first series, poem X.* 尽管诗中的意境是无法翻译的,但诗句的内容也许可以如此来转述:“Mountains rest beneath a splendor of stars, but even in them time flickers. Ah, unsheltered in my wild, darkling heart lies immortality.”引自Denver Lindley的翻译。

这里群山看似在星光下静息；他们慢慢地、神秘地被时间吞噬；没有什么永恒，不朽已经逃离了世界，在人心的无知中找到了一处不安定的居所，因为只有人心仍然记着并说着：永远。不朽或不灭，如果它最终发生，那便是无家可归。如果以古希腊人的眼光看这些句子，好像诗人是故意用它们来颠倒古希腊人的某些特定关系：似乎除了人心之外，（原本应不朽的）自然万物皆成了易逝的，不朽不再是人们外在的生活条件，而只是在人心中才能找到无家可归的庇护。不朽的事物——制品和行为、事件乃至言论，尽管心中的记忆还能将之形象化，但也已失去了它们在世界中的家。因为世界和自然成了易逝的，因为人们制造的物品，在它们完成时，已然注定了和其他存在同样的命运：从诞生伊始便开始衰败。

对希罗多德来说，言论、作为和事件，这些仅仅是因人而存在的事物，才是适合于历史讨论的题材。在所有人为的事物中，这些是最徒劳无益的。^⑦双手的制品，之所以存在，部分是因为其中包含了物质自然提供的质料，因此制品自身也引入了某种程度的持久性，这是源自自然的永在性。但是，在人们之间直接



布克哈特

发生的事情；说出的言论、所有的行动和作为——古希腊人称之为πραξεις或πραγματα，以区别于制作(fabrication, ποιησις)——却从不可能在它们说出和做出的瞬间之外持存，如果失去了记忆的协助，甚至无法留下任何痕迹。由此，诗人和历史记录者的任务，便是在记忆之外保持住某些东西。亚里士多德将诗人和历史记录者归为同类，因为他们所要打交道的就是这些东西，πραξις。^⑧通过把πραξις和λεξις，即行动和言语，转化成某种制作，即最终记录成文字，诗人和历史记录者完成了这一任务。

历史作为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当然要比记录下的文字、比希罗多德甚至比荷马还要古老。从诗歌意义而不是历史意义上说，它应是始于尤利西斯(Ulysses)，当他在费阿刻斯(Phaeacians)国王的宫廷里，倾听着关于他自己的作为和苦难——自己的生命故事的那一刻，有一个东西从他那里产生了出来，一个众所能见、众所能闻的“对象”。就是这种纯粹的发生，现在就成了“历史”。把单个事件转型成为历史，这一做法在本质上是用言辞构成“行动的仿制品(imitation of action)”。这在以后的古希腊悲剧中被采用。^⑨正如布克哈特

⑦ 指言行自身并不能留下任何证明其存在过的东西。

⑧ 参亚里士多德《诗学》(Poetics), 1448b25和1450a16-22。关于诗与历史记录(historiography)的区别，参该书第9章。

⑨ 因为悲剧就是对行动的模仿，参《诗学》第6章，第1节。

所评论的,在悲剧中,通过信史的传报,“外在的行动被隐藏了起来”,但即便如此,也不构成任何障碍来表达悲痛。^⑩尤利西斯倾听自己的生命故事这一事件,既是历史又是诗歌的典型例子。亚里士多德认为:“与现实重新达成一致、宣泄,这些都是悲剧的本质”;黑格尔则说,悲剧是通过记忆的泪水才能达成的历史的最终目的。人类对诗歌和历史最深层的动机,在这里以无比纯洁的方式得以展现,因为听者、行动者和承受者都是同一个人。但在现代,对新信息极度好奇和渴望的动机,往往在历史探究和审美愉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从本质上说,这些在尤利西斯那里都是不存在的;否则,当他面对仅仅作为新闻的历史和作为娱乐的诗歌时,早就要疲倦了,而不是深深地感动。

区分人的可朽和自然的不朽,以及由之产生的反思,在现代看来并不特别。但是,其中蕴含的却是一个伟大且充满痛苦的悖论。正是它,而非其他因素,促成了古希腊文化的伟大显象中悲剧性的一面。这悖论的一方面认为,所有事物都应以永恒的标准来判断和衡量,但另一方面又坚持,真正的人类的伟大,至少是在前柏拉图时期的古希腊人看来,存在于人类的作为和言论中;这一伟大源自——正如阿基里斯所说的——“伟大作为的实施者和伟大言论的述说者,而不是来自制作者——哪怕是诗人和作家——模仿的作品”。由此,悖论便是:伟大被理解为永恒,而人类

的伟大,却存在于那些最徒劳无益的活动中;这一两难不仅困扰着古希腊的诗人和历史记录者,它也同样搅乱了哲学家们内心的平静。

在古希腊早期,对于这一悖论的解决方案,是诗歌式的而非哲学式的。正是通过诉诸诗人赋予言论和作为的不朽荣誉,言行才得以在说出和做出的无效的瞬间之外,甚至在它们的执行者的有限的生命之外,仍能持存。在苏格拉底学派之前,可能不算赫西俄德,并没有对于不朽的荣誉真正持批评态度的人;甚至是赫拉克里特也认为它是人类的所有抱负中最伟大的一种,尽管他曾用锋利的言论抨击了他的母邦——以弗所的政治环境,但他也并未对人类事务的领域进行过这样的谴责,或者是怀疑过它潜在的伟大。

但这一情况随着苏格拉底的出现而改变了,之前,巴门尼德为之做了铺垫,之后,柏拉图的哲学成为了其顶峰。柏拉图在说教中认为,可朽的人类有了一种潜在的不朽,这一观点成了所有古代哲学学派遵信的典据。当然,柏拉图仍要面对以上的悖论,但他似乎是第一个将“渴望获取名誉,不愿默默无闻”,与渴望获得子孙的自然愿望相提并论的人;正是通过后者,大自然确保了种族的延续,而个人的不朽(αθανασία)却被遗忘了。因此,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主张是:用后者来替代前者,即只要人不断生育后代,在种族恒久生成的统一性中分享不朽,那么通过

^⑩ *Griechische Kulturgeschichte*, Edition Kröner, II, p.289.

获取名誉来拥有不朽的渴望,一样可以得到满足。当柏拉图宣称,生育子孙是一条法则时,他明显是希望,这对于“一般人(common man's)”对不死的自然向往,将是一个有力的安慰。因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再相信:通过伟大的作为和言论,凡人可以“成就不朽”^⑩[在亚里士多德的语汇中“成就不朽”(αθανατιζειν)是这样一种活动,它的目标决非必定是自身的不朽名誉,而是指普遍地占有各式各样不朽的事物]。他们在思想活动中,发现了一种潜在的、脱离整个人类事务领域的能力;而这一领域本身不必被严肃地对待(柏拉图的观点),因为,把人视为最高的存在注定是荒谬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能繁衍后代,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足够了,对哲学家而言,成为“不朽”则意味着,居住在永恒事物的邻近,并对它们保持积极的关注,但不用去做什么,无需任何作为和制造任何东西。因此,当接近于不朽事物时,人们的态度应是不做出任何行动,甚至是无言的静思;亚里士多德的“奴斯”(νοϋς),这一人类最高的直观能力,并不能将它所看到的转化为言论;^⑪而柏拉图通过观察理念得来的终

极真理,同样是一种不能被言辞来形容的αρρητον。^⑫因此,哲学家们解决这一古老悖论的方案是:不仅否认人类具有“不朽”的能力,而且也否认了:人们把自身和自己的作为和宇宙的永恒伟大一较高下,把自身所取得的不朽之伟大同自然和神的不朽一比长短的能力。显然这一解决方案的出台,是以牺牲“伟大作为的实施者和伟大言论的述说者”为代价的。

分别由诗人、历史记录者和哲学家提供的两套解决方案的差异在于:前者真正地承认了古希腊人关于伟大的一般概念。称颂可以带来荣誉和长存的声望,但它只能被赋予已经是“伟大”的事物;更确切地说,是事物所拥有的崭新的和杰出的特质使它们区别于其他,并使荣誉成为可能。这伟大是配得上不朽的,它应被归到永恒的事物之列,用它们无法超越的壮丽,围绕于凡人的徒劳无益之外。通过历史,人们几乎成了自然的同等物;但是,只有那些自觉地面对着自然宇宙的、能长久持存考验的事件、作为和言论,才能被称为历史的。由此,不仅是诗人荷马和故事述说者希罗多德,而且连同修希底德,都是最先但

^⑩ 柏拉图确信:人类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才是不朽的,即从时间的整体性上,把前后相继的所有代的人都算作是“一起存在(growing together)”的一个整体;对作为世代相继而存在着的人类而言,时间上的先后并不构成差别:γενος ουν ανθρωπων εστι τι ξυμφυεϋ του παντος χρονου, ο δια τελουϋ αυτω ξυνεπεται και συνεφεται τουτω τω τροπω αθανατον ον.参《法律篇》721。换言之,只有从属于人这个物种,一般人才得以分享不死(deathlessness, αθανασια);但这还不是接纳哲人们居住在它近旁的永恒的存在(timeless being-forever), αει ειναι。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1177b30-35及其后进一步的讨论。

^⑪ 《尼各马科伦理学》,1143a36。

^⑫ 柏拉图:《第七封信》(Seventh Letter)。

低调地为历史记录设定标准的人；这一标准在《希波战争史》的开篇便向我们申明：写下这一著作，是由于战争的“伟大”，是由于“那是一个迄今为止，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它不仅是古希腊人的，也属于大部分的蛮族世界……（它）几乎是属于全人类的”。

对于伟大的关注，在古希腊诗歌和历史记载中，得到了显明的表达。这一关注，是以自然和历史两个概念间的密切联系为基础的；二者的共同特征便是不朽。对于自然，不朽是毫不费劲也无需人的协助就拥有着的；对于人，不朽则必须是设法获取的，如果他们希望生活得无愧于诞生其中的世界，无愧于存在于周围、陪同他们获得片刻承认的事物的话。因此，历史和自然间的关联，决不是一种相互敌对的关系。在历史的记忆中，接纳的是那些通过作为和言论证明自己配得上自然的不朽的凡人，他们持久的声名意味着，他们能归入恒久存在事物的行列，尽管他们是要经历死亡的。

现代的历史概念和自然概念间的密切联系，并不亚于在历史开端之初二者间的联系，但现代的历史和自然概念，与那时的却是非常地不同。同样，二者的全部重要性，只有在其共同的基础

被发现后，才能充分认识到。19世纪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间的对立，以及自然科学宣称的客观性和精确性，在今天看来已成为过去。因为，现在的自然科学家已承认：实验是在人为的前提下对自然过程的测试，而观察着实验的观测者，同样是实验的条件，因此，“主观”的因素不得不被引入“客观”的自然过程。

核物理学中最重要的新成果，乃是认识到了：对同一个物理现象，毫无矛盾地运用全然不同的自然法则进行解释，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出于如下的事实：基于几个基本观念已确定的规则系统，只能证明十分有限的提问方式是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其实是独立于其他系统的，在那里与此间不同的问题，是被允许提出的。^⑭

换言之，实验“成了（人）向自然提出的问题”（伽利略的观点），^⑮而科学所提供的答案，仅仅只是对所提问题的答复。“客观性”问题呈现出的混淆之处正在于：假设了无需问题而存在的答案，独立于问题而存在的结论。今天我们所知的物理学研究和历史研究其实是同质的，都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对未知的探究。因此，所谓历史记录的“主观性”，和物理学的“客观性”之间的古老

^⑭ W. Heisenberg, *Philosophic Problems of Nuclear Science*, New York, 1952, p.24.

^⑮ 引自 Alexandre Koyre, "An Experiment in Measurement,"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97, no.2, 1953.

争论,几乎失去了其存在的适当性。^⑮

现代的历史学家,基本上仍未意识到:尽管数十年来,自己不得不向自然科学家捍卫自己学科的“科学标准”,但事实上,自然科学家的处境和他们也是一样;而且历史学家似乎更乐于用新的、看上去更科学的术语,来表明和重申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间的古老差别。其中的理由在于,历史科学的客观性问题,远非技术上或科学上所遇到的困惑那样简单。客观性,如兰克所言:“剔除自我”以达到“纯粹直观”(对物的纯粹地看——兰克^⑯),意味着历史学家克制自己,不做褒贬性的评论,同时保持一个理想的距离,这样才能在史料中展现出历史事件的进程。如此态度,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 1808—1884)斥之为“被阉割了的客观性”,^⑰其致命之处在于如下必然事实:大量事实中有待选取的材料,同历史学家有限的心智和生命时间相比,必定是无限的。此外,如果换一种说法,客观性意味着不干涉和不抱偏见,那么二者中,不抱

偏见似乎更容易做到,只要不加褒贬就行了;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对材料的选取总是对历史的干预,所有择取的标准,都是把历史事件的进程安置进某种人为的框架内,这和自然科学家在实验时预设自然过程如出一辙。

我们已经用现代的术语,把客观性问题陈述了一遍。这一问题是在现代才被提出的。现代的观念相信,已经在历史中发现了一门“新科学”,但这门学科,必须遵从它的“前辈”——自然科学^⑱的指导思想行事。其实,这是一个对自身的误解。比起历史学来,现代自然科学自己才是一门发展快速的“新兴”科学(“newer”science);我们将会发现,正是在现代的开端处,人类对宇宙的探索才

是二者起源所共同依傍的经验。历史科学令人好奇但充满疑惑之处是,它并没有从同时代的自然科学那里引入学科的指导思想,而是向前追溯到科学的,^⑲归根到底是哲学的态度上。不幸的是,哲学的态度正是现代准备着手清除的。这种科学的指导思想,集中体现在



德罗伊森

^⑮ 20多年前,Edgar Wind在他的评论——*Some Points Of Contact between History and Nature Sciences*中就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参*Philosophy and History, Essays Presented to Ernst Cassirer*, Oxford, 1939。Wind早已指出,最新的科学发展表明,再去提类似“历史学家们总是把自己看做是科学家”的问题,是十分不“确切(exact)”的。如此基本且鲜明的观点在随后历史科学的方法论和其他讨论中几乎没有被提到,这是值得奇怪的。

^⑰ 原文为德语:das reine Sehen der Dinge——Ranke。

^⑱ 引自Friedrich Meinecke, *Vom geschichtlichen Sinn und vom Sinn der Geschichte*, Stuttgart, 1951。

^⑲ 文中“自然科学”有二义:古代的自然科学和现代的自然科学;前者指古希腊哲人和中世纪宗教学家对自然进行沉思的自然哲学,后者指伽利略和牛顿以来的经典物理学体系。这里指后者。

^⑳ 这指的是后者:自然哲学,见注5。